

# 中项漩涡:文化标出性与格雷马斯方阵

彭 佳

(西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文化标出性理论是动态的文化关系模式,在此模式中,中项是多元的混合,它的摇摆和偏边对文化标出性起到决定性作用,并且,它的幅度和受力大小是衡量文化宽容度的重要指标。用格雷马斯方阵各要素之间关系来检视文化标出性理论,可以证明,中项融合了非正非负、亦正亦负的元素,是漩涡式的存在。文化标出性理论的三分法可以分化为多元的开放结构,是一个充满对话性和活力的符号学模式。

**关键词:**中项;标出性;格雷马斯方阵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7)05-0092-06

## Middle – item Vortex: Cultural Markedness and Greimas Square

PENG Ji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arkedness is a semiotic model describing the dynamic developments of cultures, in the model the middle – item is a cultural hybridization, its swing and deviation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cultural markedness, and its scope and force size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measuring cultural tolerance. Comparing the model of cultural markedness with Greimas Squar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middle – item is like a vortex which integrates the factors between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and this tripartite relation of the theory of culture markedness can be divided into multi – dimensional open structure, which is a dialogic and dynamic model of semiotics.

**Key words:** middle – item; markedness; Greimas Square

自现代批评理论出现以来,批评家们对破解文化和思维的二元对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最为大行其道的当属解构主义和后解构主义,它们所引发的后现代大众文化风潮充满了颠覆性与戏仿性,对于破除原本看似牢固的文化霸权有非常之功。但是,另一方面,解构主义的虚无性和寄生性,也是批评家们所激烈抨击之处。符号学家蔡秀枝就指出“无论怎样的解构、抵抗和反省,最终都会回归到某种规则,一定会规则化和定向化,然后才有可能累积下一次的力量,进行下一次的反省和抵抗,而不是单纯地、一次性地达到最终目的而再也没有进化的可能。”<sup>[1] (p82)</sup>在此基础上,她指出,符号的意义生产是不稳定的动态平衡,因此,只有开放性的模式结构,才能更为准确地描述这种意义生产的过程。

的确如此,自皮尔斯开始,符号学家们对于二元对立的破解方法,就在于建立一种更具有开放性、动

收稿日期:2016-04-30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编号:13&ZD123);2017年度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项目“符号现象学基本问题研究”(编号:2017SZYQN75)

作者简介:彭佳(1980-),女,四川泸州人,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为符号学、艺术理论批评。

态性的符号模式。皮尔斯首当其冲,用著名的符号三分式建立了“无限符号过程”,对自己的符号学模式,皮尔斯称其为“连续论”(synechism),认为它不同于二元论,后者“是单轴分析的哲学,将各项分为终极要素和彼此无关的组块”。<sup>[2](p570)</sup>对皮尔斯建立的这种三元模式,皮特里宁(Ahti - Veikko Pietarinen)认为,这是“任何追寻智慧的科学研究理论所必然具有的特征”;<sup>[3](p49)</sup>而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则写道,“三分法是皮尔斯符号研究的一个基本特色,但它绝非是一种过度简化”。<sup>[4](p35)</sup>三分法作为具有开放性、对话性的符号学模式,已经被广为接受和认可:三元关系看似只比二元关系多一元,但正是这关键的一元,延展了符号意义关系,赋予其动态性。

作为破解文化二元对立的符号学理论,文化标出性理论的基本模式也是三分性的:它将“标出/非标出”(marked/unmarked)的二元对立展开,建立了“正项-中项-异项”的三元关系;其中,中项的站位、即中项对哪一项采取认同的态度,决定了哪一项成为正项,和自身一起占据“非标出项”的地位;而未能获得中项认同的另一方则成为标出项。由于中项的站位并非固定,而是变动不居的,文化发展的动态性也就得以体现。赵毅衡指出,“对立文化范畴之间不对称带来的标出性,会随着文化发展而变化,文化的发展,就是标出性变化的历史”。<sup>[5](p367)</sup>由此可见,较之于固定、僵化的二元对立,中项范畴的划定,使文化标出性理论对文化关系的描述有了更强的动态性。并且,在这一三元关系中,标出性的变化不是绝对的一百八十度逆转,它常常是部分的、局部的,而非非此即彼。由此可见,以三分为特点的文化标出性理论,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符号学模式。本文旨在运用格雷马斯方阵对标出性理论进行观照,说明中项其实是一个非正非负、亦正亦负的漩涡式存在,而文化标出性模式具有很强的对话性和活力。

## 一、中项的幅度和受力大小:文化宽容度的指标

在“正项-中项-异项”的三元关系中,中项是一个自身无法表意的范畴,作为分别和判断其他两项正负地位的要素,它自己的意义是被正项所携卷的。用生物符号学的比喻来说,中项就像是生命视网膜上的盲点,它使得对象和自我、即标出项和非标出项可以被分别出来,但由于盲点无法看见自身,包含了中项的非标出项在日常生活中作为被默认的价值观和风格,也是无法照见自我的。赵毅衡曾指出,“生活在某个文化中的人,并不觉得自己的文化元素风格特别”,<sup>[5](p365)</sup>这种中项和正项作为非标出项的正常化和非风格化,是文化所具备的基本特征。

中项是“各种文化标出关系的最紧要问题”,<sup>[5](p.371)</sup>这不仅是因为中项偏向哪一边,就决定了哪一边成为文化的正项;更为重要的是,中项的幅度是否宽容合度,这关系到文化意义秩序能否维持。举例而言,在“无私/自私”的二元对立中,绝大多数文化在建立道德标准时,都将不寻求自身利益、为他人付出的“无私”行为作为正项加以认同,以期树立良好的行为风尚。然而,在划定异项,即定义什么是“自私”的过程中,中项必须将大多数寻求利益的行为纳入自己的范畴中,而只能把在寻求利益过程中损害了他人利益的行为才设定为异项。否则,道德标准要求过高,打击面过大,就会导致文化道德秩序根本无法维持,“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代最终陷入混乱和疯狂,秩序瘫痪,就是一个明证。

不仅如此,正项在对中项和异项施加压力时,也应当维持在一个适度的范畴内;如果正项对中项和异项进行强力的打压,甚至强制性地取消中项,就会使文化失去弹性,最终走向断裂或消亡。在《“中项”与文化“标出性”的改变》一文中,笔者曾将中国文化的超稳定性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断裂发展相对比,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因此下层的变通余地较大,能够得到差异化发展;而中世纪教会将打击面甚至扩展到了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所以最终走向了式微。<sup>[6](p144)</sup>文化要保持活力,就必须将正项施加的压力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否则,就会陷入单一、僵硬之中,最终引起异项和中项的剧烈反弹,从而引发文化和社会震荡。

在《论文化标出性翻转的成因与机制》一文中,胡易容将正项对中项和异项的压力程度与社会体制相联系,认为中项和异项受压过大的情形常见于集权社会,这种高压造成了“文化对立双方的最大紧张”。<sup>[7](p140)</sup>他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震荡和英国的温和革命为例,讨论了中项在二元对立关系中起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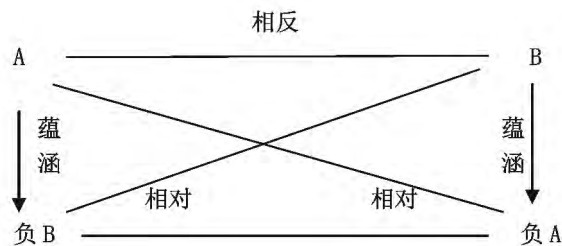
协调性。事实上,在中项受力不大的情况下,它都能起到这种协调和缓冲对立紧张的作用,使社会能够稳定而有序地发展。

前文已经证明,在文化标出性关系中,中项必须有一个合适的、较为宽松的范畴界定,确保自己是“沉默的大多数”,才能有效地维系文化意义秩序。而在实际的文化对立情况中,标出项和非标出项往往都不是单项的,而是复合项,这使得中项容纳的元素更加混杂和多元。在社会文化制度愈加宽松的今天,情况更是如此。以婚姻关系为例,尽管大多数文化仍然保留着将“婚内异性关系”作为正项的状况,但和以前不同的是,中项不再仅仅是未婚和离异群体,其他的婚外性关系都被认为是异项的情况也不复存在。在开放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如荷兰,不仅婚外的异性和同性关系已经得到社会默认,连婚内同性关系也已然合法化,从而成为了中项的一部分。因此,当今社会文化发展出现了中项范畴越来越宽泛的趋势,中项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因素,成为多元、多音、混杂交响的所在。如果说中项的范畴宽窄和受压大小是文化宽容度指标的话,当今社会无疑已经迈入了宽容度加速增高的阶段。

## 二、格雷马斯方阵与标出性

在对对立否定关系的符号学描述中,格雷马斯方阵无疑是最为著名的模式。这一模式最为完善和成功的运用,是格雷马斯和库尔斯泰(Joseph Courtes)对其用于“述真”问题的思辨,他们用四项两两对立的元素,即“是”、“似”、“非是”、“非似”建立了一个符号方阵,并得出结论:所谓“真”,是双重肯定,即亦“是”亦“似”;所谓“假”,是双重否定,即亦“非是”亦“非似”;而在“真”与“假”之间的幻觉、想象、伪装等,是处于这两极之间的游移。<sup>[8] (p312)</sup>套用文化标出性理论,如果将“真”作为正项而“假”为异项,这些游移的元素就共同构成了混杂而多元的中项,无法将其简单地归纳为“真”或“假”:它们是亦正亦负、非正非负的存在。

事实上,当格雷马斯首次运用格雷马斯方阵来分析语义空间结构时,是和他的同事拉斯特(François Rastie)用其讨论法国文化传统中的婚恋观。该方阵由四项元素构成:A、B、负A、负B。如下图所示,A和B、负A和负B是相反关系,A和负B、B和负A是蕴涵关系,A和负A、B和负B则是相对关系。<sup>[9] (p90)</sup>



格雷马斯和拉斯特将A、B、负A、负B四项分别与婚恋状况的四类情况相对应:A代表异性婚姻关系,B代表乱伦、同性恋,负A代表男性的婚外性爱,负B则代表女性的婚外性爱。他们指出,在法国的文化传统中,A(异性婚姻)是合法的、有规则可依的婚恋状况,负B(女性婚外性爱)则是正常的(normal)、未被禁止或者说被默许的。负A(男性婚外性爱)是不合法且被部分禁止的,而B(乱伦和同性恋)则被视为不正常的(abnormal),是绝对的禁忌。也就是说,在这四项相互对立的元素中,A作为正项,它最为排斥的是它的异项B,而对它的负否项和否异项,即负A和负B,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

如果在标出性理论模式中检视格雷马斯和拉斯特的这一分析,就不难发现,在这个方阵的正项A(异性婚姻关系)和异项B(乱伦、同性恋)之间,存在着混合性的、宽阔的中间地带,即负B(女性婚外性爱)和负A(男性婚外性爱),它们和这个方阵中未曾提到的其他项(未婚、婚前性关系)一同构成了法国婚恋观的中项,也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它们都对正项A,也就是异性婚姻关系采取了认同的态度,这决定了正项在文化中的伦理地位。

在这里,必须指出两点:第一,负A项(男性婚外性爱)作为中项的一部分,它其实是游移在“部分禁

止”和“绝对禁止”之间,因此,也可以将其视为被部分标出的异项。在许多文化中,中项这一宽阔的区域和异项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的壁垒分明,其边界是有弹性、可以移动的。如同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对宗教净化和禁忌的文化规则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文化建立的分类在本质上是人为规定的,而符号现象事实上则是连续的:这种分类旨在维持人类经验的秩序。<sup>[10](p5)</sup>而事实上,由于人类的文化经验是变化的,范畴的划分也是变通的:这和语言范畴分类的情况极为不同,后者是相对清晰和固定的,这也是为什么赵毅衡会认为语言标出性变化情况较少,而文化标出性变化较大,需要详细的模式加以研究的原因。在法国文化中,男性婚外性爱在中项和异项之间的游移变化,也说明了中项受力程度较轻,使其可以部分地容纳异项,这证明了中项受力程度和法国文化宽容度之间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第二点是,如果将负A项(男性婚外性爱)这一在法国文化中既可以被视为中项、也可以被视为异项的部分划入异项范畴,那么,异项的标出性就有了强弱程度之分。这一点在语言学家凯罗尔·麦尔-斯科顿(Carol Myers-Scotton)的研究中得到了证明,在《语码和后果:语言多样性的选择》(Codes and Consequences: Choosing Linguistic Varieties)一书中,她写道“尽管主导性的非标出项往往只有一项,但标出项和非标出项却不一定只是单数。”<sup>[11](p5)</sup>可以看到,麦尔-斯科顿其实已经意识到了非标出项可以包含多个层次,即赵毅衡提出的标出性模式中的正项和中项:她将正项称为“主导性的非标出项”,而其他的非标出项,就是本文模式中所说的中项,它常常是复数的、混杂的形式。而且,麦尔-斯科顿认为标出项也不一定只有一项,也就是说,标出项本身是复数的、多元的。这就可以解释二元对立经过文化标出性模式的三分关系,可以被分解为多元构成的原因。并且,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地提出疑问:驱动标出性翻转的,是被标出项的哪一部分?是标出性较弱、滑动在中项和异项地带的部分,还是标出性较强、作为“异项之异项”的部分?

格雷马斯和拉斯特的这一研究激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比如,谢弗(Heinrich Schafer)就继续使用这一方阵,来研究灵恩派内部宗教认同的各项关系,以试图解释宗教实践与教条之间的差别形成。克罗地亚学者安图洛夫(Sandra Antulov)和伯特萨(Mislava Bertoša)的研究则进一步发展了格雷马斯和拉斯特的婚恋方阵,他们认为,在当代的克罗地亚文化中,可以用如下关系来描述几种婚恋情况:A代表异性婚姻关系,B代表乱伦、恋童、性强暴等行为,负B代表异性婚外性爱,负A则代表同性恋关系。<sup>[12]</sup>按照他们的关系项设定,那么,A(异性婚姻)仍然继续作为合法项而存在,负B(异性婚外性爱)则是正常现象。负A(同性恋关系)是不合法且被部分禁止的,而B(乱伦、恋童、性强暴)则是绝对禁忌,是严重的罪行。

较之于格雷马斯和拉斯特的分析,安图洛夫和伯特萨的研究覆盖的面更加宽阔,包含了更多的性禁忌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运用格雷马斯方阵所进行的讨论,体现了欧洲文化在婚恋关系的标出性上的变化,即,作为异项的同性恋由于获得了中项认同,而部分地实现了翻转,为社会成员接纳。事实上,整个婚恋观念在西方社会的松动,的确和同性恋亚文化的努力推动密切相关。作为原有的婚恋关系中标出性最强的部分,也就是异项之异项,它强有力地推进了标出性翻转的过程:在现在的欧洲文化标出关系中,中项所包含的范围不只是认同异性婚姻的未婚或婚外独身人士,它不仅囊括了法国传统中的女性婚外关系,也包含了异性婚前关系、男性婚外关系以及同性恋关系——只要这些关系不明确地涉及和伤害到婚姻关系,它们就处于中项的灰色边缘地带中而不会被标出。中项范畴扩大,而受力程度减轻,这是当代文化氛围进一步宽松化的表现。

用文化标出性模式来分析安图洛夫和伯特萨的研究结果,就会发现,在当代欧洲的婚恋秩序中,异性婚姻关系作为正项,是受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和接受的;乱伦、恋童、性强暴等作为异项,是绝对的标出项,为社会全体所否定和不齿;而非正非负的中项,它的存在则是相当微妙的:它既不属于婚内异性关系,受法律保护并且得到极大认同;也不属于全民深恶痛绝的犯罪行为和道德禁忌。它是一个混杂的存在,尤其是在社会宽容度极高的今天,它的成分进一步向多元化发展。

不仅如此,如果将文化标出性的历时变化加以审视,就可以发现,中项不仅是非正非负,也是亦正亦负的。“亦正”这一点容易理解:正项既然是规则、是典范,中项自然会向其靠拢,对其进行效仿。“亦

负”则指的是,在标出性变动的过程中,中项会逐渐将异项的一部分纳入自身范畴中,使其不再成为完全的禁忌。上文中所提到的,男性同性恋行为从西方文化中绝对的异项、标出项,成为当今被包容、被默认的中项的一部分,就是一个例证。中项的这种漩涡式存在,即中项在两极间的摆荡和混杂,以及它的变化所带来的标出性改变,体现了标出性各项之间所具有的对话性。

### 三、中项漩涡形成的动因:实质性对话主义的存在

对于文化标出性为什么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胡易容提出了“内在翻转机制说”。他指出,文化标出性的改变既有外在因素,即,“不同时期的主导因素变化所构成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总体变化逼迫正项让位,标出性翻转”;<sup>[7](p141)</sup>另一方面,文化内部也有内在的翻转机制,即试推机制的存在。既然文化总是朝各个方向试错的,那么,作为被标出的异项,也可能成为文化试错的新方向,从而获得翻转的机会。这种文化试推法,其实就是文化与其他文化、与文化内部亚文化各项的对话,正是这种对话使得中项成为混杂多元的漩涡式存在。

所有的符号过程都是对话性的,这是以庞齐奥(Augusto Ponzio)和佩特丽莉为代表的对话符号学派所提倡的观点。在《打开边界的符号学》一书中,庞齐奥和佩特丽莉讨论了巴赫金提出的“实质性对话主义”(substantial dialogism)对符号学研究的重要性。“实质性对话不是由文本的对话形式(即形式上的对话)所决定,而是由文本中的对话程度所决定;文本中的对话性也许呈现为对话的形式,也许不是。换言之,实质性对话决定于对异性开放程度的高低。”<sup>[4](p23)</sup>此话看似复杂,实际上是说,“实质性对话”其实是各项之间对话的可能条件,是各项之间本体上的关联,而不是形式上它们有没有对话关系。即使是在对自我(即正项)的认同这种看似单一的文化现象中,也存在着向他者(异项)敞开的可能,如他们所写道的“实质性的对话并不是声音、对话者,或者对话交换中涉及的身体的数量问题。相反,它描述了一种条件和态度,描述了自我朝向他者的、对话的倾向,甚至在一个单独的符号或者说单独的声音中也是如此。逃避对话主义是不可能的,正如逃避他者也是无法实现的一样。事实上,不论我们对他者喜欢与否,我们都服从于他者,以至于若非在和他者的相互关联中,自我的同一性就无法得以保持。在对他人漠不关心的幻象中,在每个人自己的视角、价值观系统、想法和声音中,对话主义得到了最强烈的展示。”<sup>[4](p384)</sup>

在这一视角下检视中项漩涡何以存在,就不难发现:正是因为中项在对自我(正项)的认同中,包含了对他者(异项)敞开的潜能,它才能够在对话动力的驱动下不断进行“试错”,寻求文化发展的各种可能方向;也才因此成为非正非负、亦正亦负的多种文化现象的混杂。标出性在格雷马斯方阵各项之间的变化移动,其实就是这些元素之间进行的对话过程。就如任何符号和文本都不可能是单音、单义的,标出性模式中的非标出项和标出项都是复数形式的,它是无法被降低至单音或一元的所在。而中项作为其间最为宽泛的范畴,尽管在形式上是单项的,在实质上却是多元、多音的,在中项包含的各个元素之间,在中项和正项、异项的关系中,都存在着彼此对话的倾向和可能。就如解释漩涡可以从不同方向做出可以成立的多重解释那样,中项漩涡在正负方向上的不停试错,使文化可以向多元方向发展,而不会陷入单一和僵化。

在上文所举的、西方婚恋观标出性变化的例子中,标出性模式的对话性得到了很好的展示。首先,对于男性同性恋亚文化这一作为“他者”的异项,中项保持着开放的态度,保留了将其纳入自身范畴的可能。其次,在中项自身的范畴内,滑动在中项与异项边界之间的元素,也在进一步地展开和中项其他元素之间的对话,以求更多地向中项移动,更多地进入中项的范畴之中。这种文化各项之间的彼此关联,就是符号学家们所说的“开放网络”:如果将各种文化现象作为型文本或者符号子系统来看待,那么,正是各个型文本或符号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性,也就是对话性,推动着中项不断自我更新,是它保持漩涡式存在的持久动力,而这正是文化发展动态性的明证。

## 四、结论

文化标出性理论对“正项-中项-异项”的划分,是典型的符号学三分模式,它是一种敞开而非封闭的意义模式,体现了文化动态发展的特征。在这一模式中,中项这一亦正亦负、非正非负的漩涡式存在,是各项之间对话关系驱动的结果:因为各项之间“处于相互作用的流动状态之中”。<sup>[13](p69)</sup>这种对话性证明了文化标出性理论在哲学范式上的先进性,以及将其用于多元文化发展描述的无限可能。

### 参考文献:

- [1]蔡秀枝 彭佳. 符号学与空间理论的遇合:蔡秀枝教授访谈[J]. 符号与传媒 2012 (5).
- [2]C. 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 [3]Ahti - Veikko Pietarinen, Dai Weiwei, Zhao Xingzh. *Extensions of Charles S. Peirce: An Interview with Anti - Veikko Pietarinen* [J]. 符号与传媒 2014 (9).
- [4]Susan Petrilli, Augusto Ponzio.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 [5]赵毅衡. 符号学[M]. 台北: 新锐文创 2012.
- [6]彭佳 王万宏. “中项”与文化“标出性”的改变[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 (5).
- [7]胡易容. 论文化标出性翻转的成因与机制——对赵毅衡一个观点的扩展[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 (5).
- [8]A J Greimas & Joseph Courtes. *Semiotics and Language: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M].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82.
- [9]A J Greimas Igridas Julien, François Rastier. *The Interaction of Semiotic Constraints* [J]. Yale French Studies, 1968 (41).
- [10]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M]. London: APK Paperbacks, 1984.
- [11]Carol Myers - Scotton. *Codes and Consequences: Choosing Linguistic Varieties* [C].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2]Sandra Antulov, Bertoša Mislava. 'Beyond Morality.' Discourse on Homosexuality in Croatian Newspapers from the Sociosemiotic Perspective: Comparison of Two Periods. KNJIŽEVNOST I KULTURA [EB/OL]. <http://www.sic-journal.org/ArticleView.aspx?aid=81#>
- [13]彭佳. 论文化“标出性”诸问题[J]. 符号与传媒 2011 (2).

(责任编辑:张立荣)